

我的學思歷程*

于宗先**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人過了七十歲，該打的仗都打了，不論成功或失敗，都已成過去，對未來不再有什麼奢望。近年來，學界的朋友將過去奮鬥的歷程寫成書，一方面表示對人生的考驗交了卷；另一方面，可送親友當作紀念品，總比送水果之類的東西來得有意義。近年來，也有不少人向我建議過，我總覺手邊待完成的工作還很多，撰述過去那些「過五關、斬六將」的事蹟，在我看來，並不重要。況且，將苦難的人生告訴讀者賺取他們的同情，也不應該，重要的是：讀者的時間很寶貴，不該浪費他們的時間去瀏覽一位平凡學者的生涯。最近老友，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韓效忠與其執行長江顯新再三建議，不妨將過去學習與思索的歷程寫出來，讓年輕學子不要因家貧、考試落第、就業遇挫折，就灰心喪志；只要堅定信心，繼續努力，必有所成。基於這個考慮，改變了我原先的堅持，乃將自己的學思歷程奉獻出來，與大家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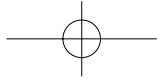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于宗先院士

壹、年輕時代醉心文藝創作

在中學時代，我對文藝就很感興趣，曾學習寫過古詩，對曹操的古詩很著迷，對臧克家的新詩很嚮往，所以經常寫些新詩自娛，有一年青島市立中學舉辦新詩朗誦比賽，朗誦的詩必須是自己的創作，我以「血淚話流亡」贏得了市中詩人的頭銜。自此之後，就經常寫些新詩，發洩對時局的感受，對別離父母的哀愁。來到臺灣後，當了三年兵，在當兵期間，也不忘寫新詩述懷，因為當時自己像浮萍，對未來覺得茫茫然，沒有什麼打算，所寫的新詩屬悲情的多。偶而我也寫預言詩，有首預言詩是「末日」（由中國文藝協會留用）。到了民國70年，我所預言的詩

* 本文係于宗先院士於民國93年6月寫成，98年10月補充，並在98年12月14日應政治大學邀請，擔任四維講座之演講稿。

** 中央研究院院士



竟一一應驗了。例如詩中有一段是：塔斯社的喉嚨瘖啞，不再做撒謊的喇叭；《真理報》說了一句實話：「赤色的末日來到啦」。到了民國83年，我將50年以前所發表的新詩，選擇了一些，以「劫餘低吟」，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退休後我又寫了些新詩，自感不合時宜，只有藏拙。

民國41年夏，我考入臺大經濟系，由於圖書設備簡陋，既無教科書可讀，也缺少有關的參考書可參考，故有較多的時間，讓自己浸潤在西方翻譯文學書堆中，那時對但丁神曲、雪萊、拜倫、濟慈、朗費羅、泰戈爾等人的詩很感興趣。尤其對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十分着迷，一連看了三遍，甚至連不太懂的《莎士比亞全集》，也瀏覽了一番。當時很佩服朱生豪的譯筆之美（他的莎士比亞中文譯本比梁實秋的中文譯文早了二十多年）。在大一、大二時讀的經濟學書籍並不多，讀的西洋翻譯文學名著倒不少。尤其經常見到自己筆名「法天」的新詩在中央副刊上出現時，對自己而言，是一大鼓舞，在當時能在中央副刊發表新詩的，還有余光中、童山、朱詩繁等人。我還有個天真的想法：將來要右手撰寫經濟論文，以增進我的專業；左手寫新詩，以充實我的精神生活。對於新詩，我倒有自己

的看法，即詩要易懂，在意境中有寓意，既不無病呻吟，也不矯揉造作。我常想，凡流傳長久的詩，都是一般人看得懂的詩，像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由於婦孺皆懂，故能流傳千年而不衰。可是今天的新詩，有些既難讀，又難懂；或只能看，不能讀。一般人能背誦的新詩，可說並不多見。如果寫的新詩不易背誦，則流傳下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基於這種想法，在我所寫的新詩裡，切戒艱澀難懂，力求含有寓意。

貳、大學時代未打好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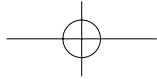
大學四年，從教授那裡得到經濟學的知識並不多，而對自己將來是否能成為經濟學者，也從未想過，因為隻身在臺，無依無靠，為了生存，畢業後，一定先就業。至於如何就業？當時想到的，考高普考是條出路，於是在暑假集中精力先考普考，及格後，再考高考，高考及格後，始有機會到政府及公營事業部門找工作。在那個時期，民營企業尚不夠發達，無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只有公家機構有機會。這與今天就業的主要出路完全不同。到了大四那年，對現代經濟學的知識，才從施建生及邢慕寰教授那裡得到些新東西，從而對經濟學

這門課也產生了較大的興趣。而我也利用空間，翻譯兩本經濟學類的書，一本是韓森的《凱因斯革命》，另一本是《國民所得》。譯完後，雖沒有出版，但對閱讀英文經濟學書籍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施建生教授聽說我翻譯了《凱因斯革命》一書，還特別在上課時向同學宣布一番，當時我感到很高興。

說實在的，大學期間所學十分有限，對經濟理論只是一知半解，對統計方法也是似懂非懂，與今天臺大經濟系的學生相比，相差太遠。臺大畢業之後，曾憑我的高考及格證書分發到臺灣電力公司總務處工作，我在那裡上了一天的班就辭職不幹了，因為那時在臺電工作必須簽合約書，規定在短期間不得辭職出國升學。同時也因為我考取郵局的高級郵務員，而且那裡沒有這個限制，所以我改去臺北郵局報到。不過，在郵局工作，為時也不長，只工作了十個月，因為我體認到作刻板式的公務員生活不合我志趣，久留不如早離開。於是我又考取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當時我之未考臺大經濟研究所，乃是考慮到那裡的教授都是老面孔，怕學不到東西，乃改變主意，希望將來從事新聞工作，而這種改變與我愛好文學有關，以為有文學作基礎，將來可作一位出色的

新聞記者。在政大新聞所讀書期間，沒有撰寫經濟文章，卻寫了不少新詩、散文及譯作，並在報章雜誌發表，賺取些稿費，維持我的讀書生活。與今天的稿費比起來，那時的稿費較高，寫詩，一個字值一塊錢。我以兩年的時間完成了碩士學位，被校方留下擔任講師。本來南伊大有位教授為政大新聞所提供一名全額獎學金，那時所長曾虛白教授推薦我，可是沒想到有位同班同學竟中途殺出來，他用私人關係先我得到這個全額獎學金，我也只有放棄去美國攻讀新聞的念頭。如今再回頭看看我以後的發展，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我得到那份獎學金，是否能順利讀完新聞博士學位，也很難說；但經濟學的領域要比新聞豐富多了。

總結大學四年及研究所二年，我並未打好治學的基礎。在經濟學方面所知膚淺；在新聞學方面，毫無實務經驗；至於在文學方面，只能說是「淺嘗即止」的境界，因我缺乏幻想力，更不會編造有趣的故事，成就會有限。至於個人的志趣，自忖不是當公務員的料；從事新聞工作的興趣也不濃；再回到經濟學領域？可是對研究經濟所具備的條件尚不具備，儘管有了講師職位，但不敢誤人子弟。為今後何去何從，也曾煩惱過。



叁、從未夢想過的赴美留學

在讀政大新聞所階段，有一對知己的朋友，他們已去美國讀書，經常與我通訊，稍知在美國讀書的情況。他們再三鼓勵我出國讀書，從未想到出國深造的我竟也萌生留美的念頭。同時，我也想到自己的條件，是否有資格出國深造？以我隻身在臺的身分，又身無長物而言，出國留學，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經考慮之後，我決定去嘗試一下。為期達成這個目的，我曾數度申請美國領事館的簽證，都遭到了拒絕，他們的理由是：我單身在臺，去了美國會留在美國不回臺。直到我結了婚，生了大女兒，有了家室，才獲得美國領事館的簽證。當時，赴美讀書，需保證金二千四百元美金，這對一位身無分文的我是個重大的負擔，幸而這對老友願借給我錢當保證金，我岳父為我籌了些錢，大表哥也借給我一些美金，我才於民國48年年底，別離妻兒，在基隆搭上貨輪「海宇號」向美國進發，那時的心情宛如做夢一樣，不相信自己也有機會出國深造。在海上航行了四十五天，途經高雄、菲律賓和夏威夷，才抵達洛杉磯，然後搭灰狗汽車去密西根大學。學校已上課，我註冊兩週後，將借來的二千四百美元的保證金歸還老友，身上

真是囊空如洗。我住在一所學生公社性質的宿舍cop，為支付房租及飯費，只有到一家俱樂部（league）餐廳去當清理餐桌的雇工（busboy），有位學長曾給我留下一部自行車，在寒冷的北風中，我踏着那部自行車去打工，每次回到cop宿舍時，飯菜都冷了，吞到肚子裡去之後，總覺胃部不舒服。同時由於不適應2、3月密西根的花粉，喉嚨發炎、咳血，以為得了肺病，心情真是抑鬱極了。但是，想到出國機會難得，又想到前途未卜，只有咬緊牙關，度過那段適應期。所以，無論刮風下雪都要去打工。另一方面，應付學校的功課也相當吃力，因為在臺大的基礎太差，而英文也不靈光，在各方壓力下，那日子真不好過。到5月下旬，學期結束，就與數位同學聯袂去紐約打工，而且也決定轉學到較暖和地方的大學。我很順利地申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的入學獲准，而且可免大部分的學費，於是決定轉學。在紐約餐館打工三個月所賺的錢，足夠九個月的開銷，不必在上課期間去打工，可全心讀書。自轉到印大之後，一切都很順利，而且也沒有花粉的反應，及喉嚨的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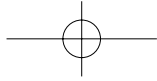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肆、奠定研究基礎

在印大的學習階段，是我一生學習中的黃金時代，能得到這個學習的機會，對我個人而言，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我必須在未來五、六年的時間，打好做學問的基礎，以備將來回臺灣時，能為臺灣學術界作出一番事業。對於課程，我的選擇是：為打好經濟理論的基礎，我修讀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國際經濟及金融經濟；在經濟分析方法方面，我修讀數量方法，它包括抽樣理論、統計方法、數理經濟學、直線規劃、賽局理論。同時為奠定數理基礎，我也到數學系旁聽了新代數、偏微分、微分方程等。在攻讀博士學位階段，我的讀書生活很單純，每日奔走於教室、圖書館和宿舍三個點上。每日花在圖書館的時間為最長，因為圖書館中的藏書很多，可以滿足我的求知欲。在疲倦時，就到東方部門去找有關中國的藏書來讀。在過去看不到的奇書，都可在圖書館中找到。尤其有關中國大陸出版的書及刊物，也藉此機會多讀了些。這對我以後作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一方面使我認識西方在經濟學領域的進步情形，該如何提升臺灣的學術水準，另一方面也啟迪我於學成返國後，我該作那方面的研究，並且使所作的研究成果對政策形成有參考價值，從而也可

以實現「學術報國」的宿願。

民國52年秋，開始參加博士學位學科考試。在專業方面，很順利地通過了，在經濟理論方面，因為個體、總體和經濟思想史三門課要同時通過，才算及格。只要有一門未通過，其他兩門也要重考。民國53年春，我通過了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剩下的，則是博士論文的撰寫。在選擇論文題目時，我決定以美國經濟問題為選擇範圍，最好能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內完成論文撰寫，以便早日返國服務。由於我對數量方法有較大的興趣，對國際貿易也有點偏好，乃計劃以數量方法去分析對外貿易問題，於是我選定「對進口轎車需求及其對美國就業的影響」為論文題目。那時候的電腦設備相當龐大，效率卻不高，為了計算對汽車進口需求函數的迴歸式，我經常跑電腦室，實驗各種迴歸式，以期能找到一條最理想的迴歸式。

撰寫論文期間，無功課壓力，有心情於每個週末去欣賞聞名世界的歌劇、芭蕾舞、話劇和電影，讀更多的中國傳統小說；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也是在這個時期閱讀的。這使我重溫大學時代閱讀西方文學的生活，也使我想一個人的刻板生活需要經常調節，文學作品、音樂無疑是最有益的調節身心的工具，我



也欽佩武俠小說作者的想像力。

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由四位教授組成，其中一位於民國54年去委內瑞拉講學，我於每章寫完之後，要郵寄給他，請他評閱，在當時，既無e-mail，也無傳真機，稿子郵來郵去，十分不便，正因為這個原因，本可於民國54年秋完成的博士論文，只有延到民國55年夏，才得以通過我的博士論文。

伍、決定返國服務的動機

完成博士學位，對每位臺灣的留學生而言，都曾為繼續留美就業或返國服務作選擇，結果是：多數留在美國。我也為此考慮了很久，我直覺的想法是：留在美國，對美國學術界而言，不過滄海之一粟，不具任何重要性；返國服務，則會對臺灣的學術發展有些貢獻，而且也容易為社會所肯定，況且「學術報國」一直是我的信念。那時，臺灣學術界急需輸入新血，方有趕上時代的希望。基於這個考慮，我毅然決然於民國55年8月束裝返國。返國就業的選擇也很重要，我非常瞭解自己的性格，絕不適合合作公務員；至於從商，祖宗遺傳中，就沒有會賺錢的基因。最後，還是選擇了作研究與教書的工作。我申請到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同

時，該所也安排我在臺灣大學商學系兼任副教授，傳授我在美國所學的商情預測方法，藉收教學相長之利。從此，我就沒有離開過學術界，如果有人問我：你對你的選擇會後悔嗎？我的答案是不後悔。

在民國50年代，臺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人才奇缺，去外國留學學成之後，絕大多數留在國外，能夠回到國內服務且長久居留的可算是鳳毛麟角，因為國內待遇太低，物質環境無法同美國相比。沒出國的人不會有這種對比，出過國的人，無法避免這種對比。同時在那個時代，凡不回國服務的人反而有一套說詞：回國服務的，都是在外國無出路的人，用來證明自己留在國外之正當性。同時，在國外的留學生也喜歡批評國內教授水準太低，用的教材很落後。儘管這是事實，他們卻忽略了國內的歷史背景及社會環境。如果每位留學生學成之後都留在外國，有誰來提升國內的學術水準？這也是我回國服務的主要動機。

我回到臺北後，受到老師、同學、鄉親的熱烈歡迎，感到十分溫馨。政治大學正計劃設立經濟學系，政大校長想延聘我去籌備經濟系，我因為已接受中研院的聘書，不能改變我對中研院的承諾，何況有個博士頭銜，在學術上尚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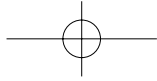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奠定基礎，就去擔任行政，也不適當。不過，我在中研院服務期間，還是逃脫不了兼任行政工作。毋庸諱言，兼任行政工作多多少少會影響我的研究工作；但因當時我的學程最早完成，責無旁貸，只有戮力以赴。

在我到中研院經濟所服務的最初幾年，所內，除了我一人外，尚無一位研究人員具博士學位，可知在當時羅致人才之不易。該所最初的工作是訓練具學士與碩士程度的研究同仁，輔導及資助他們出國留學，希望他們於學成後能回所服務。至於延聘在外國學成的人回國，那是件相當困難的工作。有人回國服務一年，或二年，然後，又回到外國去教書，能夠堅持留下來的並不多見。當時所面臨的學術環境，有人形容如沙漠，既無經費購買現代的書籍及雜誌，又無適當的人相互切磋，共同研究，所能利用的參考文獻主要是個人從外國攜回來的，故這種描述並不為過。臺灣經濟正在起飛，而學術領域需賴大量的人才投入，國內訓練的碩士較多，博士則非常的少，而出國留學的，即使到了民國70年代，學成回國服務的數量仍不很多，主要因為國內外生活水準相差太大，因此，在那個階段，回國服務的人必須具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

想法。

陸、我的研究重點及經驗

在民國57年秋，臺大與中研院經濟所在臺大經濟系共同成立經濟學博士班，我被合聘為該班的副教授，策劃博士班的建立，同時也延聘在外國有成就的教授來臺作短期講學，以期將國內學術水準拉抬起來。對於碩士班和博士班的學生，完全採取美國大學的教法，教材是新的，參考讀物多以外國剛出版的雜誌為藍本。我們訓練學生，強調兩方面，一是經濟理論，一是數量方法。在中研院主持經濟所的邢慕寰教授，於民國56年出國研究，所務便落到我頭上，民國60年又出國研究，所務仍由我負責，這對我而言，是歷練，也是挑戰。但是，我必須找時間作研究，我研究的範圍是為臺灣經濟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用以分析與預測臺灣經濟，同時利用計量模型作為探討臺灣經濟問題的工具。邢教授要我為經濟所建立一套經濟預測規範，定期為臺灣經濟作預期。在起初，沒有電腦可利用，只能用電動計算機，利用Dolittle Method作迴歸分析，一個上午只能計算出一條具兩個自變數的方程式。同時自民國56年起，我也參與行政院全國總供需估測小組，為臺灣經濟建立計量模型，用作年度預算之



用。關於為臺灣經濟建立計量模型，早在民國53年留美學人劉大中教授曾為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前身）設立一個包括九條方程式的計量模型，我們以此模型為基礎，漸漸將其擴大，成為一個較完整而預測能力較大的模型。不久，這個模型由行政院主計處接收過來，我們將此模型擴而大之，由年預測，進而有半年預測和季預測，而這個模型已由九條方程式發展到二百多條方程式，不但作總體經濟預測，也為各種經濟政策之效果作測試，作為選擇政策之參考。除此，我在中華經濟研究院設立經濟展望中心，也建立一個季模型，作定期預測之用。同時也派研究員赴美學習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之設立，以補計量模型之不足。

為研究臺灣經濟，為其建立計量模型，輔助政策選擇是我研究工作中的主要項目。三十多年的實務經驗使我感覺到：利用計量模式作分析、預測經濟問題的工具也有其限制。在過去受兩方面的限制，一為計算工具，一為所需統計資料，到民國70年代，計算工具問題解決了，資料問題仍是待努力的方向，即在模型中所需要的變數仍無適當資料可用；即使有了資料，其可靠性也值得懷疑，這是作實證研究過程中，最

難解決的問題。雖然我也兼任政府統計單位的顧問，統計單位的工作人員在蒐集資料時，也有些難以處理的問題，不能克服。這就是何以很多留學返國服務的人，即使在外國學了計量方法，返國後，多轉向數理經濟方面的鑽研，因它不需要統計資料，甚至也不需要電腦計算，較省時省力，而且也容易在國外雜誌發表研究成果。為了總結過去三十年的經驗，我於民國87年同何金巡先生特別撰寫了一本《全國總供需估測 回顧與展望》，敘述設計臺灣經濟計量模型的經驗、模型的演化、特色及功能，以及其應用的成效，該書已由行政院主計處出版問世。

柒、探討臺灣經濟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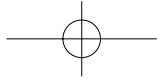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在我代理中研院經濟所所長期間，我曾有個宏願，即為臺灣經濟發展作學術上的見證，因為臺灣的經濟發展是由貧變為富有，由落後變為進步，尤其在兩岸軍事對峙下，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使臺灣經濟有了突出的成就，因而贏得國際上臺灣經濟奇蹟之讚譽。為了找出臺灣經濟高度成長之原因及探討今後經濟發展之趨向，於是我策劃了一系列的臺灣經濟研究與研討會，並將成果彙編成書，包括臺灣對外貿易發展、工業發展、所得分配、物價問題、人口成

長與經濟發展等，同時，我也先後負責主編了二套臺灣經濟論文集，即自戰後有關臺灣經濟發展的論文，且具學術成分的，分門別類地彙編起來，供有興趣研究臺灣經濟的學者作參考。除此，我也主編了經濟學百科全書，將近年來重要的經濟學名詞都編進去。這些參考文獻對研究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關於舉辦經濟問題研討會，在今天看來，是稀鬆平常，無著墨價值的事，可是在60年代初期卻是國家大事。在當時，仍是戒嚴時期，儘管我們的研究範圍不受限制，可是一旦牽涉到群眾的學術活動也要十分謹慎。民國62年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而物資也極度貧乏，賴以維生的米、糖也匱乏不足，致物價波動十分嚴重，使人又回想到二十多年前惡性通貨膨脹的噩夢。政府遂採用限制物價不得上漲的高壓手段；結果，市面物資一夜之間不知去向，人民生活更緊張。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嚴肅形勢，使我想起「學術報國」正是時候。於是我籌劃了「全國物價問題研討會」，在該年11月底召開，並邀請財經官員及經濟學者參加。政府聞知此事後，執政黨中央開會討論是否應停止召開此次研討會，他們認為這個研討會對通貨膨脹會

火上加油，市面物價會因我們的討論加重其嚴重程度。所以，他們勸告我，不要召開。我對問題的認知及我的性格，使我拒絕他們的勸告。直到開會前的一天，新聞局還派人到我家警告我，此事體大，要我再考慮考慮，但我毅然拒絕了。開會那天，情況相當緊張，尤其是錢思亮院長，他本是十分小心的人，怕我惹來麻煩，要我給他代撰的致詞稿低調些。開幕式完結後，許多新聞記者向錢院長索演講稿，錢院長還躊躇再三，才交給記者。開會期間，有位教授怕業者找他的麻煩，放棄報告他的論文，藉故南遊不出席，可是身為財政部長的李國鼎卻一連三天，都坐在臺下聽講、記筆記，他這種學習精神令人敬佩。

研討會結束後，新聞媒體說中央研究院已走出象牙塔，並稱讚此次研討會的成功，同時我也將會議結果報告給政府，供他們在應付通貨膨脹時作參考。我們建議的重點：物價上漲時不能用制止的強硬手段，應疏通供需管道，或採取緊縮貨幣政策，也會產生一定效果。行政院長蔣經國特別接見我，要我向他報告研討會的重要結論。自這次研討會舉辦成功後，我們對舉辦全國性研討會有了信心，同時執政當局從此不再過問我們所舉辦的研討會。之後，我們陸陸



續舉辦了許多有關經濟發展的研討會。政府對我們的建言有雅量接受，我們也感到安慰。同時，我們在數位經濟學院士協助下，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每次會議所需預算都獲得政府的全力支持。在此，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當時經濟所並沒有多少研究人員，而且三分之一在國外讀書，每次全力幫忙完成這項工作的，只有二、三位同事，他們的辛勞使我銘感難忘。

民國68年，中美斷交。執政黨在數位學者建議下，成立一個研究機構，專門研究大陸經濟及國際經濟，經數次討論後，政府才決定成立中華經濟研究院，除了研究大陸經濟、國際經濟，還包括臺灣經濟。聘請留美學人蔣碩傑教授擔任院長，我為副院長，因為蔣教授仍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書尚未退休，只有暑期及寒假才有時間回臺，因此，籌備的工作就落在我身上。在當時，我仍擔任中央研究院經濟所所長，每日奔走兩個單位，其忙碌情況可想而知。籌備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首要工作是羅致研究人才，但人才難覓，於是決定不在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挖角，致求才更難。為解決此問題，一方面到國外去延攬行將完成博士學位的人，另一方面資助具碩士程度的助理上臺大經濟學博士班的課作

初步訓練，再送出國外攻讀博士。這個院原設三個所：即大陸經濟、國際經濟和臺灣經濟，以及後來增設的經濟展望中心。由於這個研究院主要由政府出資，部分由民間企業捐獻，為了這個緣故，我必須強調它的立場：即超然、獨立、客觀，既不為政府政策背書，亦不為個別企業的利益說項。儘管過去廿年來臺灣的政治環境變化很大，人事更替頻繁，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立場迄未改變它的客觀、獨立和超然的立場。無庸諱言，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的行政工作佔去了我大部分的上班時間，我只有利用晚間、週末的時間作研究。由於住家與辦公室相隔咫尺，我所利用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每天的下午7時至12時。在此段時間，辦公室不再有電話、既可靜思、可冥想、更可構思我要撰寫的論文。

捌、臺灣經濟學術研究的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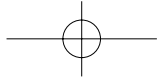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自民國80年以降，臺灣的經濟學界，起了很大的變化，即留學國外的學生，在當地找事不易，同時國內的待遇已大幅提高，很多學成的留學生紛紛返國，一般國立大學經濟系在延攬人才時，有了選擇的自由，這不像60年代，甚至70年代，經濟學界羅致人才完全是需求市場，只要有高學位，去大學任

教一定無問題。同時一般經濟學教授所發表的論文，無不遵從西方的規範。由於臺灣在國際上的位置太小，一般有關臺灣經濟實證問題之論文，在海外發表較不受歡迎，於是般新進教授多以數理模式，寫成論文，以便在國際期刊發表。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所發表的論文，只有同行的少數人可讀懂。顯然，這種論文與臺灣實質經濟問題間有很大的差距；也有些資深教授，雖不寫論文，但寫教科書，也是模仿西方教科書的形式，再加上少數國內的案例，說明某些經濟現象。對於臺灣經濟問題以較嚴格地取材方式，有系統地將之寫成專書的，並不多見，這對臺灣經濟學界而言，不無遺憾。對於經濟學術研究，在我看來，有兩條途徑：一是經濟分析方法的探索，一是經濟問題發生的原委及求解之道的探索，前者是用來服務後者的，而後者是藉前者之助，可達成研究的目的。近卅年來，西方經濟學界有個明顯的趨勢，即運用太多的數理模式去表達經濟現象。由於所牽涉的變數有限，在主觀設定的因果關係上，雖能自圓其說，但多無政策上的參考價值。在臺灣的經濟學者中，諸多是在美國直接或間接受過教育的人，他們為了升等，或為了揚名學術界，無不在數理經濟範

圍內鑽研。本質上，他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套邏輯關係的推行，對實務上的應用價值較少。由於相沿成風，對於臺灣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也就被忽略了。更令人難以接受的，不少經濟學者認為有數學模式的論文，才是理論；無數學模式的，就不算理論。他們將數學模式視同理論的觀念正影響年輕學者的治學態度。我對之憂心忡忡。每慮及此點，我就許下一個願望，即待我卸下行政工作後，一定有次序地將臺灣經濟問題，一一有系統地寫成專書供人們參考，因為我對過去六十年來的臺灣經濟發展的歷程相當熟悉，撰寫起來，不致有摸不清門路的毛病。同時也希望能從實際經驗中，找出一套可解決經濟問題的法則來。

玖、退而不休的學術生涯

民國85年10月，我卸下中華經濟院院長的職務，同時也自公務退休下來。適時，中國經濟企業研究所董事會邀請我去主持這個研究所，而這個研究所距我搬去的新家很近，我正可利用它的空間，實現我的願望。這個研究所之自有基金很少，又無正常收入來源，如果做研究，也是需要起碼的經費，來支持這個研究所的運作。幸而俞國華先生有個



文教基金會，我將我的撰書計畫告訴了他，他十分贊成，於是我有機會實現我的願望，在第一期計畫中，有四項專題計畫：即臺灣泡沫經濟、臺灣通貨膨脹、臺灣中小企業的成長及臺灣土地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源。我找到王金利教授，他曾是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的同事，他非常贊成我的撰書計畫，樂意參與研究。第一期計畫完成後，跟著有四種專書問世，王金利教授的協助很大。對臺灣經濟研究的第一期計畫完成之後，我又擬定了四本書的計畫，即「一隻看得見的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臺灣金融體制之演變」、「臺灣賦稅制度之演變」及「臺灣人口與經濟發展」，俞國華先生答應了，可是不久，他就因病而去世了。對於第二期計畫，俞國華文教基金會繼續支持我，而且仍由王金利與我撰寫，迄今已完成了以上四種書的計畫。這八種專書均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民國86年，老學長韓效忠，即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徵詢我願意不願意研究大陸經濟，他的基金會樂意支持，我欣然同意，於是我就擬定了五本書的計畫，包括「大陸國有企業的發展」、「大陸金融體制之演變」、「大陸財稅制度改革」、「大陸農業

發展」、及「中國大陸不平衡經濟發展」。這些計畫，由臺灣的學者負責撰寫，大陸學者負責蒐集資料及解釋法規，他們差不多在預定時間內，完成了這個計畫。至於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所資助的第二期計畫，它包括「兩岸農地利用比較研究」、「兩岸股市面面觀」、「國有企業與國營事業的比較研究」、「兩岸中小企業發展的比較研究」、「兩岸的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兩岸人口政策與經濟發展」。同時我們也改變撰寫方式，即在一個相同的主題之下，由大陸學者撰寫大陸部分，臺灣學者撰寫臺灣部分，我則總其成，撰寫導論、綜合比較分析、提出政策涵意及結論，迄目前為止，已完成「兩岸農地利用的比較研究」、「兩岸股市面面觀」、「國有企業與公營事業比較研究」及「兩岸中小企業比較研究」，可說計畫進展的相當順利。這種研究方法，在海峽兩岸而言，比較新穎，從而可發現兩岸異同之處。除此，宗倬章教育基金會支持我們完成「臺灣經濟的浴火重生」。

民國86-87年東亞金融風暴在泰國爆發，很快蔓延到東亞地區，韓效忠董事長同我談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否要召開一次地區性研討會，探討這個有

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他的基金會願意支持這個計畫的進行，於是，我邀請東亞十國的專家，分別撰寫其本國的金融危機問題，於是我們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其成果*From Crisis to Recovery: East Asia rising Again?*在新加坡出版，且受到佳評。

民國91年，也是臺灣推動民營銀行已滿十年，大陸旅加學者徐滇慶教授，一直想在大陸推動民營銀行之成立，乃同我談起，認為臺灣的經驗可資參考，韓效忠董事長對這個想法十分贊同，他的基金會願意資助這方面的研究，於是，我邀請了國內的金融學者分別撰寫此方面的論文，並決定到北大去討論，以便吸引較多的大陸金融界人士參與。此項研究完成後，乃於民國92年10月間去北京舉辦研討會，並編成專書出版，使更多的讀者能讀到臺灣在這方面的經驗。

對我個人而言，自民國85年10月退休之後，在朋友協助之下，順利完成有關臺灣經濟發展的專書9種、主編3種；對大陸經濟研究，親自參與撰寫的有4種；時論集有4種；至於論文，中英文論文有三十多篇，自感未虛度歲月，而且還有些收穫。

關於撰寫專書的心得，它可對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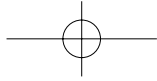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經濟專題的來龍去脈弄個清楚，從歷史角度去回顧在經濟方面所發生的事情，會將問題看得更清楚。儘管事過境遷，但對以後的經濟決策者也會有鑑古知今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內心的感覺上，我退休後的生活更加充實，而且也更有意義。

拾、晚年的反省

自己已到了「從心所欲」的年紀。但事實上，難以享受到傳統式的「從心所欲」的樂趣。因為現實環境變了，而且徹底地變了。既不能離開現實生活，仍須花些心思應付現代社會觀念與行為的衝擊。回顧過去，自感對「學術報國」這個宿願，有始有終的作了不少。惟由於資質平平，既無「過目不忘」的天資，也無「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能耐，只有效「笨鳥先飛」的方法，多用些心，多賣些力，去完成每項任務。

如果有人問我：「你對過去走過的路，有沒有遺憾或反悔？」，我的答案是「沒有」。個人的天資、家庭背景和社會環境影響我走過的路程。在每一階段，對每個職位，我都是全力以赴。

「勤能補拙」是我力行的信念。我常對朋友說：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總想把鐘撞得更響亮些。也有些知己朋友



對我說：年屆八十，該休息了，何必早出晚歸？我總是用家鄉的一句俗語：「小車不倒向前推」來作擋箭牌。不過，當大勢已定，我會順其自然，不恃不求，無怨無悔。無論如何，我會盡量利用我的餘生，希望在學術上，仍能作出些貢獻。如果有一天無外來資助，支持我的專書撰寫工作時，我會改變我的寫作方向，對社會和人生問題多作些思考與創作。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異人的足跡》系列紀錄片，本館修纂處、審編處策劃製作。數百年來，因緣際會來臺的外國人（異人），在臺灣經濟或文化發展上扮演具有啟蒙意義的關鍵角色，是臺灣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環。「異人的足跡」系列紀錄片深度報導19、20世紀重要外國人的在臺足跡與軼事，藉此重新回顧臺灣各個領域的起源，同時感懷他們的貢獻。本系列計有斯文豪、長谷川謹介、高松豐次郎、陶德、森山松之助、馬雅各、磯永吉、必麒麟、藍欽、富田直亮等人之事蹟。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1月至6月），葉健青編註，2010年7月出版。本書收錄民國27

年1月至6月間，蔣氏電孔祥熙宋子文會商解決金融問題具體辦法、發表「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青年書」，陶德曼大使提日方和平方案以及國民政府重申抗日立場保障領土主權完整等資料。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7月至12月），蕭李居編註，2010年7月出版。本書收錄民國27年7月至12月間，蔣氏在首屆國民參政會致詞、桐油借款、推動對美外交、呼籲美國參預國際事件、強化西北西南軍政人事以及整頓軍政等資料。

《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蔡雅祺著，2010年12月出版。身處於戰爭陰影底下的滿洲國女性，面對滿洲國境內處處配合日本所實行的戰時體制和槍後動員行動，對於這樣的戰爭有何等的矛盾和衝擊？而對於身處滿洲國底層的女性而言，「國家」、「戰爭」究竟有多重要？當她們忙於應付日常生活瑣事之時，戰爭對她們來說，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本書主要從官方論述的脈絡探索滿洲國當局如何塑造戰時婦女的形象？如何透過教化和宣傳賦予其對於國家社會的責任？除討論滿洲國女性在當時整體氛圍下所遭遇的處境，及其所真實面對的生活外，亦企圖從這些日常生活細節當中，呈現戰爭陰影底下滿洲國女性的集體心靈。